

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 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

匡宝三

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在南开大学做了一年研究工作之后，即由初次见面的汤象龙同学的介绍，转到陶孟和先生（1888~1960）主持的社会调查所（设在北平，今北京，下称社会所）工作，那是在1933年。从那时起一直到陶孟和先生去世近30年的期间里，我都在陶老先生领导之下做研究工作。我未曾上过他的课，以前也未曾见过他，但实际上他是我受业最久的老师。在此长时期中，我是在他培养、奖掖、赞助下进行研究工作的。我不是最早参加他创办的社会所的工作人员，但是我是在他领导下工作时期最长的人之一。缅怀先师，就我所见所闻和所查到的书刊记载，记述他在学术事业方面的活动和贡献。

* 此文草就后，曾寄请有关方面审阅，承陶先生子陶愉生、女陶维大、陶先生至戚钱昌照、沈性元、陶先生友好陈翰笙、徐盈、陈振汉、社会所同事杨西孟、王子建、汤象龙、曾炳钧、千家驹、郑友揆、严仁廉、张培刚、严中平、罗尔纲、姚曾荫、李文治、汪敬虞、章有义、彭泽益、宗井滔、聂宝璋、张国辉诸位先生来函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我对此深表谢意。此文现在经过修改，但其中如有错误和不当之处，仍当由我本人负责。

一、早年在天津受维新教育，继赴日本学教育学，后在英国学社会学，成为我国最早的著名社会学家

陶先生名履恭，字孟和，以字行，1888年生，天津人。清末，天津提倡新学的教育家严修（字范孙）创办家塾，延陶仲明（孟和先生之父）为塾师。1901年陶仲明因病早故，乃延张伯苓继之，于1904年改家塾为敬业中学堂。孟和先生一直在此就读。后此学堂迁往南开地区，改称南开学校^①，孟和先生并在此校第一届师范班助理教学^②。由于他奋发努力，成绩优异，旋以官费生被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教育学。当时，他对中外地理特感兴趣，曾与同学搜集大量资料，编译《中外地理大全》一书，共二卷，上卷为中国之部，下卷为外国之部，内容周详，受到学校和读者欢迎，在十年中再版七次^③。

陶先生留学日本，为时恐只有二、三年。听他说过，他曾因事回国，后改赴英国伦敦大学，学社会学。其时仍在清末。他在所译《社会进化史》一书的“序”中说，“我在十三年前最初研究社会学的时候，哈蒲浩士（Hobhouse）教授就举出这本书做参考”。所说“十三年前”是指1910年前。他在另一文《社会调查》^④中说，“六年前的春天，我在伦敦同同学梁君要编纂一部述中国社会生活的书”，所说“六年前”是1912年前。据此，陶

-
- ① 参考严仁赓，《回忆陶孟和先生》一文，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三集。
- ② 这是根据陶愉生来函所述。他说，“我在南开时，曾看到过南开第一届师范班毕业生的名单，第一名为梅贻琦，名单中没有我父亲。我家的长辈曾对我说，在张伯苓先生教第一届师范班时，我父亲是以相当于现在所谓的‘助教’身份出现的。”
- ③ 此书用陶履恭名与杨文洵合编，中华书局1916年初版。
- ④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期，1918年3月。又见《孟和文存》卷一。

先生就读英国，至晚是在1910年前，而在伦敦大学毕业获得科学学士学位，是在1913年。所说与梁君编著之书，即“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1923年再版^①。这一著作是由陶先生在191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The Family in China”（《中国的家族制度》）扩展而成（此文发表于英国《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 Review, 1913）。此书是陶先生论述我国社会组织和社会思想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研究社会学的最早的一部著作。当时陶先生才27岁，但此书表明了他已经是一位学贯中西、熟悉古籍、卓有识见的学者。此书至少作出了以下三方面的贡献：（一）提出了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中国旧时代的伦理、政治、风俗、文学、宗教等，无一不从家族出发，而最后又回到家族。中国的家族具有许多社会功能，如养老、救贫等。它是封建专制暴虐统治的基础，但又在政府职能较少情形下保持一种无人管的自治状态。由于工业不发达，几乎人人务农，家族收入微薄，但家族所有成员甘苦相同，等等。所有这些情况，使家族制度在长久的封建社会中成了极其重要的社会稳定因素。（二）作者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未可以此概彼，这种研究方法和识见，在我国近代早期研究著作中，还是不多见的。（三）批驳西方人士对于中国社会所作的歪曲论述。书中举出西方教会以及很多人士批评中国的祭祖风俗，认为是偶像崇拜，是崇拜鬼妖。作者批驳了这种谬论，认为中国的尊崇和祭祀祖先，是对于家族过去一些光荣历史的怀念，所谓慎终追远，具有教导和鼓励后人的作用。即使是勤劳劳动人民，父母常常以先人如何勤劳和受苦事迹教导其子女。从社会组织来说，祭祀祖先是具有它的积极作用，

^① 此书亦名《中国城乡生活与劳动》（Life and Labour in China）。

未可厚非的。又西方学者对佛教传入中国所起的影响，多持否定论调，说佛教只是造出了虚妄的来世，除偶像崇拜外，没有对孔子思想体系增添了什么，等等。作者在书中用了两章的篇幅，从哲学、语言学、数学、宗教等方面，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在思想界及大众生活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所有以上论述，一方面表现了陶先生的博学和富有创见，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治学的科学态度，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高尚品格。

陶先生在英国研究社会学，大概受韦伯教授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的影响很大。韦伯与肖伯纳等共同创立费边社，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费边社人创立的。他们认为进行社会改革必须研习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而韦伯则为该学院的主要主持人。韦伯对于劳工、失业、贫困、老年人等问题，做了很多调查，并对工时、养老金、工会组织等问题在立法上，提出了建议。韦伯夫人还在1912年新创了一个名叫“费边调查部”，从事工业管理等问题的调查。他们针对英国资本主义出现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企图通过立法和各种措施加以改善，而为了对于各个问题能有确切的认识，认为需要对各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①。韦伯夫妇进行的这许多社会问题调查研究，对当时英国工会组织及活动、一些企业国有化运动、以及工时、工资等问题的立法，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恐怕也对陶先生有很大的影响。陶先生先学教育，原为启迪民智，挽救时弊。到英后改学社会学，大概由于认识到改革社会和研究社会各种问题，更为重要。上面提到的他与梁君合写的英文本《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无疑就是他在英学社会学联系中国实际所作出的最早的研究成果。以后回国，协助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提倡研究社会科学，倡导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运

^① 参看薛肇成等译《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动，以及随后创办社会研究机构，实地开展社会调查和社会经济研究工作，追溯学术思想渊源，恐与在英国伦敦大学所受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影响有关。

二、协同蔡元培改组北大，并 提倡新文化运动

陶先生约在1914年由英回国，在1914~1928年期间任北京大学教授、名誉教授。蔡元培是在1917年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陶先生对蔡元培改革北大，极力赞助。他和蔡元培都是当时学术界名流学者。现在摘录我所见到的点滴记载，以证上说。（一）“据萧三回忆”，“毛泽东（1918年在北大任职图书馆时）经杨昌济介绍，萧曾随他去访问过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人”^①。（二）1920年初杨昌济病故后，“蔡元培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贖金”^②。（三）1922年蔡元培“与李达、陶知行（即陶行知）、陶孟和、高一涵、胡适、张慰慈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③。以上事实说明，陶先生是当时以蔡元培为首的学术界的著名进步人士之一，他除在北大教授社会学等课程而外，与进步人士往来甚多，共同赞助北大名师和发表政治主张，对学术界和社会舆论影响很大。由于在学术上和政治上他与蔡元培都是契合无间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主办的北大的改革和发展，非常热心效力。这一点也有两事为证。（一）陶先生在1919年赴欧考察时，时时注意为北大罗致人才。是时他在英国见到李四光和丁燮林（丁西林），即盛赞他们为“不多觐之材”，致函胡适说“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

① 高平叔，《蔡元培与毛泽东》，《群言》1986年2期。

② 《群言》，同上文。又见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第54页。

③ 上引《蔡元培年谱》，第66页。

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①后来李、丁两位俱被北大延聘，使北大又增加两位著名教授。（二）陶先生知识广博，对新出版书籍，非常注意，对图书馆入藏书籍很热心。他在英国时即为北大图书馆购买了两本新书，一为关于社会改造问题的，一为关于化学的，他致书胡适说“请转告守常兄”^②。从这些事可以看到，他是何等热心于教育和学术事业，为北大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号角，陶先生正是在这时与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等倡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主要人士之一。他在《新青年》、《新教育》等杂志发表了很多文章。他对《新青年》杂志非常热心，尝与友人盛赞《新青年》的精神。他在1919年3月致胡适函中说，“设《新青年》之精神得以贯彻，亦可喜也”^③。陶先生从《新青年》第二卷起，即不断在其上发表论文，计从第二卷（1917年）直至第八卷（1920年），共发表文章十余篇，其中有论文，有演说稿，有文学译文，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极力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改革和刷新，提倡研究社会问题和调查社会实际情况，表现了他的新思想、他的科学态度以及他的求改革社会的精神。他的这些文章，即使在现在读来，还给人以清新之感，还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其立论和对问题分析的意义。陶先生是博学的，在《新青年》发表和《孟和文存》收集的著作所涉及的方面很广，有政治、教育、历史、文学以及社会各个方面。本文不能全面地概述他在上述各个方面的论著，但他在这个时期（1916~1924年）^④在政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80页。

② 同上书，第80页。

③ 同上书，第33页。

④ 《孟和文存》除收有《新青年》部分著文外，还收有《新教育》、《太平洋》、《努力》等杂志的著文，时间起自1916年至1924年。

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上的特出贡献，不可不述。这至少可从下列三个方面来说明。

(一)陶先生主张改革社会制度，使“民国”“变为人民的国家，民治(民主)的国家”。他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文章，其最重要者有《社会》(《新青年》第三卷第二期)，《我们政治的生命》(《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战后之欧洲》(原名《游欧之感想》)(《新青年》第7卷，第一期)，《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孟和文存》第一卷)。在《社会》一文中，除从理论上阐述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产生和作用而外，还指出，我国“举凡家族制度、婚姻制度、劳动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交际制度、乃及其他无量数之制度，何一不亟当改革，谋根本之刷新”。在《我们政治的生命》一文中，则从推翻专制的观念和掀倒奴隶的桎梏说起，最后提出，我们“要使八岁的民国，变成人民的国家、民治(民主)的国家”。在《游欧之感想》一文中说，英法美诸国有了这一番大经验，他们想改革，返顾我国，“让我们大家一齐联合起来，去解决我们自己最迫切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吧”。陶先生这些主张和呼吁，以学理和现实情况为根据，是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是表达了人民大众的要求的。陶先生的改革社会制度主张的一个特点，是他的科学态度。他认为要改革社会制度，必须先了解问题之所在。他在《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一文中，认为一个社会问题不是简单的，不是孤立的，而是很复杂的。彼此有连带关系的，因此，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的见解就是先求了解。”“有了真的了解，就得到真的解决。”

(二)陶先生主张开展社会各方面的调查，尤其是乡村调查，并对中国社会问题作出了分析和提出了他的见解。在这方面，他发表的重要文章有《社会调查，(一)导言》(《新青年》第四卷第三期)，《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孟和文

存》卷二)，《中国的人民的分析》（《孟和文存》卷一），《贫穷与人口问题》（《新青年》第七卷第四期）^①，《女子问题》（《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新青年之道德》（《新青年》第四卷第二期），《欧美之劳动问题》（《孟和文存》卷二）等。在《社会调查，（一）导言》一文中，他一开头就说，“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了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的功用。一则可以知道我国社会的好处……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碍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他在阐述中国史籍对于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记载特少等之后，还提出“所以我们要从事社会调查，应该先从乡村生活农民生活方面着手”。陶先生这个“宏愿”，从1926年他创办调查研究机构起，是全力为之奋斗的。他的《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一文，是这个“宏愿”的最早的贯彻。在1914~1915年间，有一个“北京社会实进会”服务团，曾对北京各区人力车夫职业与生活的情形，做了一些调查，陶先生受该会之托，将调查资料编写报告，此文是该报告的节略。陶先生在此文最末说，“吾之撰此文，希望吾人尽其所能，多少改进为吾人交通上辛苦之同胞，俾其日有进步。”此文恐怕是我国学术界对于劳动人民生活最早的一篇记述和研究，于此可见陶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开拓精神。《中国的人民的分析》一文，是针对那时口头上咏赞共和制度而不了解人民的情形而写的。他在没有人口统计与调查资料情形之下，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免强”“推测”中国人口的构成如下：（1）“极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小农人。”（2）商人，其中一大部分是小商贩。此外还有大商人、盐商与洋商。（3）工人，“我们一大部分的工是农民兼作的，如织布、织篮”。“又一大部分的

① 《新青年》各文先皆用陶履恭名。以后著作用陶孟和名，自此文始。

工是由商人兼作的。”纯粹的工人是极稀少的，大概除了在铁路
上与各商埠的工厂里以外，并没有工人的。”(4)“有资本的工业
家”，“势力很微弱”。(5)银行家，主要向政府贷款。(6)士，
“不能独立生产，是要靠着人吃饭的”。他结论说，“欧洲宪政
的发展是靠着贵族大商业家与工业家所谓第三阶级的，最近才是
靠着劳动阶级与妇女的，我们靠着那个阶级呢？民治（民主）是
一个高尚的理想……要设法增高人民的程度，使他们有资格能够
实行那个理想”。陶先生这篇论文，是按职业分析中国社会的构
成。这个分析显然不是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但他从各业人口的
比重来探讨中国社会的问题，在分析方法上是具有开拓性的，在问
题的提出上也是具有根本性的。此外，“贫穷与人口问题”一
文，指出“中国的贫穷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
系大”；《女子问题》一文，指出妇女地位的改变，要从经济、
教育、思想三方的发达，才能解决；《新青年之新道德》一文，
指出新道德是创造的（非旧道德），进取的（为人的），和有知
识的（新知识）。这些见解无疑是进步的，是具有真知灼见的。

（三）主张改革和发展大学教育，拥护平民教育运动。在这
方面的重要论文有《论大学教育》（《孟和文存》第三卷）、
《大学课程问题》（同上）、《留学问题》（同上）、《论平民
教育运动》（同上）。陶先生在《论大学教育》一文中，指出我
国提高学术和发达文化的必要以及当时大学之少和质量之低。必
须注重改革大学教育。他认为“今日大学改善之问题，不全在财
政，而尤在乎人才。盖二十世纪之新发见，厥为组织。苟得其人
而善为组织，则事毕举”。陶先生此言，是以蔡元培先生在北大
的改革成效为其根据的。他自己亦为北大罗致人才，如前所述。
陶先生还参考国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用函授法、设公共图书
馆等办法，发展公民大学教育，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可贵的建议。
在《大学课程问题》一文中，他反对枝节的、零散的学习，参考

国外大学经验，提出要设科学通论这样的课程，使学生能得到系统的概括的知识，并提倡师生共同定期会晤和自由讨论所读书刊而提出的问题。这些意见，看来到现在仍然是有意义的。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留学问题，提出应派“在中国环境内受了专门教育”的优等毕业生。他对于过去大量出洋，“形形色色、活动驳杂”的留学生，感到“使吾厌烦不置”。他在《新青年》的《随感录》（第四卷第四期）表述了上述感想，并说“吾观吾国国立大学三数英秀之才，其学问，其眼光，其见解，其思想，其德行，远出所谓留学生者之上，其不及留学生者，即未能常用西餐，乘自动车，散步于通衢，或流连于跳舞场而已”。陶先生这种见解，后来体现在所创办的“社会调查所”大量任用本国大学毕业毕业生进行研究工作上。

三、主持社会调查所，开创我国 社会经济研究的园地

陶先生在《社会调查，（一）导言》一文所述“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的“宏愿”，终于在1926年开始生根发芽了。

陶先生所提出的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同。在1926年2月，美国的一个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分配和管理使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愿捐赠专款三年，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该基金会随即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在该会之下增设一社会调查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并聘陶先生主其事^①。这个机构一成立，陶先生即把过去多年的构想和初步进行的调查研究（如上述《中国乡村与城镇生

^① 见《社会调查所概况》1933年。

活》和《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进一步加以贯彻。他首先提出三项研究课题，一为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二为对北京工人生活费的调查研究，三为对北京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其时，调查研究人员及计算人员仅有8人，其中骨干系来自北大和他校毕业生，如樊弘、杨西孟、王子建三位就是最早参加是项工作的。上述三项工作在陶先生和李景汉（任研究主任）指导之下，在1927~1929年间都完成并出版。樊弘《社会调查方法》，1927；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其中杨西孟做了大量统计工作），1928；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此外，在陶先生指导之下，由王清彬、林颂河等编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年出版）一书。上述这些调查研究工作，都是开创性工作。这些工作的进行和在短期内完成，在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上，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给随后社会调查所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所说开创性工作，至了有两个重要方面值得特别指出。一是陶先生特别注重调查研究的，是工人和农民的生计问题，这些人构成国民的极大多数，并且是生计最为贫困，需待解决的。后来陶先生在杨西孟著《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序中说，“本所在民国十五年成立的时候，便觉得生活费是劳动问题，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在中国实有系统调查的必要”。这就是他为什么着重调查研究工人生活费的原由。在《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书中，调查了288户工人家庭的组成，职业收入和支出，支出的项目，失业，借债等情况。这些工人包括人力车夫、制袜、制花、理发、招待、学徒等男21种职业，女12种职业。小学教员，调查了12户。陶先生特别指出，小学教员收入低，而对国家，特别是对于下一代，所做的贡献大，了解这一个重要阶层的生计情况，非常重要。这个调查，户数虽少，但仍可从调查中了解这个重要阶层不少情况（见此书的第一章，引论）。在《北平郊外乡村家庭》一书中，共调

查了164家，其中一个村100家距城甚近，村人职业主要是工匠、车夫、小贩等，另三个村64家是以种地或打石为业的农民家庭。调查项目主要是家庭人口、婚姻、收支、教育、借贷等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陶先生创办机构和从事社会问题调查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重点，是在于系统观察和确切认识我国社会基本群众的各种社会问题。“以供计划经济建设者之参考”（见《社会调查所概况》（1933年）一、宗旨）。陶先生在学术上这种开拓精神和实干精神，在当时学术界实在是少见。二是陶先生主持的调查，强调调查方法的科学性。他所主持的北平生活费调查，工人部分，共调查了6个月，由调查员每日到各家记帐（星期日除外），并且由女调查员担任，以便于向家庭主妇了解帐目。通过记帐法，累积材料，然后再进行分项计算，系统研究。像这样的详细调查研究，在当时也是首见的，而为以后扩展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生活费调查研究开了先河。

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是个行政管理机构，在其下附设一个学术研究性质的“社会调查部”，乃是权宜之计，对于调查研究事业的发展，终非所宜。对此，身主其事的陶先生，当然感到更有改变的必要。大约在1927或1928年他在致胡适函中说，“现在能够明白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人很少，就是稍为明白，也缺乏远大的眼光。像这个小机关永远做一个行政机关的小附庸，终非长久之策”。“我现在正在起草一种意见书及计划，将来请你教正”^①。陶先生的意见和计划，就是使这个附属机构变为独立的机构，并加以发展。而这个计划终于在1929年7月1日实现了，即把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独立机构，更名为社会调查所。《社会调查所概况》说：“十八年七月改组以后，本所始有独立之组织。首由中基会聘陶君孟和为所长，而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所内规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480～481页。

模亦略事扩充。”“专门学术机关之规模于是乎粗具”。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社会调查所是一个专门研究社会科学的学术机关。这样的学术研究机关的创立，在我国实以社会调查所与南京政府设立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8年成立，1929年开始工作）为最早。正因为社会调查所是一个独立的专门学术机关，自1929年成立后至抗战前一段期间（社会调查所于1934年与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沿用社会科学研究所名称，隶中研院），各项调查研究工作乃得以大量开展。可以说，这一段期间，是社会所的兴盛时期，也是陶先生的“宏愿”开始得以实现的时期。兹举他在这一期间领导这一研究机构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述之如下。

（1）指导思想

陶先生办理社会调查研究事业的指导思想，在1918年《社会调查》一文已发其端，在1932年《社会调查所概况》小册子中所述“宗旨”中，亦已作了概说，但系统的叙述，是在他1944年的一篇讲稿《中国社会之研究》^①中，这可以说是他长期办理社会调查研究事业从理论上所做的总结。只有充分了解他办理社会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才能理解自1926年社会调查部以后各项调查研究事业的发展等等。兹录他在《中国社会之研究》所述要点如下。

“要研究中国社会，当然是研究我们目前的，现时的社会。此项研究，首先需要对于社会做系统的观察，就是应用社会调查的技术。……为研究便利起见，必须将它划分为若干方面或多少专题，从事观察探讨。由多少人通力合作，一步一步的做去。他们日积月累所得的成果，可以使我们扩大对于整个社会的认识”。

^① 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编印，1944年2月。

“更确切的认识现时的社会，不能以限于考察现状，同时还须追溯它的过去。人类是有历史的，他的现状主要的是历史的产物。……所以要研究今日的中国社会，必须对于过去的中国社会予以探讨。”

“社会学的观点是看社会的总体，不单看它的某一方面；是注意人的全面生活，物质的，感情的，知识的等等。而不是单看他的一种生活，如经济学专注重人的物质生活。但人有了好的物质生活，未必便有幸福的社会生活，如夫妇关系，社会关系未必同时健全”。

以上所录，仅是陶先生论述的片段，但由此可以看到他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思想，即为了认识它的整体，必须对它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且要各方面通力合作地进行研究。他举出社会生活（如生活费用），社会组织（如家庭），社会制度（如商品交换，雇佣劳动，婚姻等），人口情态等，都是需要研究的社会问题。而在理论方面，则有社会盛衰、民族兴亡等理论。我们随即可以看到，从1929年以后（事实上是从1926年以后）社会所的各项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就是在此指导思想之下进行的。在此顺便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在1934年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后，即沿用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名称，但至1945年起，又改用社会研究所的名称呢？这完全不是由于陶先生对“社会科学”这个概念有何疑义，相反，他认为社会学是社会科学较近发展的一个学科，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是科学。他曾著一文“社会科学是科学吗？”^①，力驳认为社会科学不能称为科学的种种议论。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45年又改称社会研究所的原因，我没有听他说过，我猜想是因为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范围

① 《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30年3月。

很广。中央研究院在初创时，曾着手开创这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但终因人力单薄，只有陈翰笙先生主持的社会学组工作得以积极进行，其他组的工作多未能开展。大概陶先生总结多年办所的经验，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事实上并没有进行研究它所包涵的所有学科，既然如此，反不如用“社会研究”的名称较为符合实际。还有一个问题，自1929年以后，社会所的研究项目以经济问题为最多，有些原有研究项目如人口问题，劳动问题等，以后亦未能继续，为什么陶先生没有把社会所改称为经济研究所呢？我想大概他认为社会研究可以包括经济研究，同时他是以社会学名家主持这个研究机构，用社会研究所这个名称，正符合他办研究机构是在于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一贯宗旨，也标明他锲而不舍的科学研究精神。

(2) 社会经济问题调查研究的全面展开，并与其他研究机构通力合作，推进研究事业的发展。

单就1932年终编写的《社会调查所概况》所述来讲，那时研究科目已有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劳动问题、人口问题、统计10类，有研究员12人，研究生（协助或独立从事研究工作）10人。在这些研究科目中，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劳动问题、人口问题、工人生活费统计，近代经济史几项是重点。在农业经济方面，有曲直生、韩德章、王守礼等参加工作。那时进行的主要调查研究工作有，（一）河北、山东棉花贩运调查，（二）河北深泽县农村经济调查，（三）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作调查河北清苑县农村经济，（四）定县集市调查，（五）安国县药材市场调查，（六）华北粮食生产、运销、消费调查。在工业经济方面，有吴半农、王子建、王镇中等参加工作。工作主要有（一）编辑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丛书，如“铁、煤及石油”、交通业等。（二）调查全国重要工业，先从轻工业棉纺织业开始。在劳动问

题方面，项目最多，这与从1926年起即开始此项工作有关。计有：（一）续编《第二次全国劳动年鉴》，（二）《国际劳工组织》，（三）河北及平津劳资争议之研究，（四）塘沽工厂工人调查，（五）上海工人家计调查，（六）华北铁路工人工资调查，（七）天津面粉工人工资调查，（八）华北纺织工人工资调查，（九）山东中兴煤矿工人工资调查，这些工作由杨西孟、林颂河、曾炳钧、刘心铨、吴铎等继续进行。在人口问题方面，主要整理和研究近代中外人士对于中国人口的估计和研究各省人口统计，由王士达担任。在统计方面，主要是编制《北平生活费指数》和《月报》（这是我国最早编印的生活费指数），编著《指数公式总论》等，主要由杨西孟担任。在近代经济史方面，主要是利用故宫文献馆档案材料，系统地研究过去二百年来经济发展状况。这项工作有汤象龙、罗玉东、刘隽等参加进行。以上这些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所提出的课题。陶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从学术上继续研究这些社会问题为社会改革提供依据，这是很自然的。

社会调查所除在本所开展研究工作之外，还与其他研究机构通力合作，共同推动社会经济研究工作的发展。计有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主持的社会学组合作进行农村经济调查，计有清苑县农村经济调查和浙江农村经济调查资料的整理，及工资理论研究。后一工作是由樊弘担任的。这些调查研究，都根据具体情形，或归中研院整理，或由社会所整理，充分体现为发展研究事业而表现的通力合作精神。另外，社会所还资助南开大学何廉主持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不久改名为南开经济研究所）举办天津工人生活费调查和天津地毯工厂劳工状况调查。还有，上海工人家计调查以及编写上海工人生活费指数，亦是 by 社会所资助与当时财政部驻沪调查货价处合作进行。后来天津、上

海工人生活费指数的继续编制和公布，以及天津、上海物价指数的编制和发布，都可溯源于社会所对上述调查研究和资助与合作。

社会所是时的研究工作，亦蜚声海外。1931年国际工业关系协进会(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Association)在荷兰海牙召开世界社会经济会议，特先期委托社会所提交《中国之工业与劳工》一文，后由陶先生与林颂河撰述，同年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在上海举行第四次会议，亦先期托社会所提交《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一文，此文后亦由陶先生撰述。以后此项国外学术交流，继续不断。

以上所述，主要是1929~1931年期间社会所的各项调查研究工作。在1932至抗战前，各项工作继续发展。除农业、工业经济研究有吴半农、千家驹、韩德章所著《广西省经济概况》，王子建、王镇中所著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而外，财政金融和对内、对外贸易研究，也都成为研究重点。在财政金融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千家驹的《中国的内债》，吴承禧的《中国的银行》，朱炳南、严仁赓的《北平之市财政》，余捷琼的《中国新货币政策》等。在对内、对外贸易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巫宝三、张之毅的《福建省食粮之运销》，张培刚、张之毅的《浙江省食粮之运销》，蔡谦、郑友揆的《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1919，1927~1931》及巫宝三的《中国粮食对外贸易，1912~1931》等。此外，在经济史方面，有汤象龙的《咸丰朝的货币》，梁方仲的《一条鞭法》等。

在这一时期内，作为社会所的一种学术期刊而由陶先生和曾炳钧主编的《社会科学杂志》于1930年初创刊了。此刊主要发表所内研究论文，以后一直刊行。这也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创举。在第一期，有陶先生和陈翰笙先生等人的学术论文。在1933年社会所还创刊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发表所内这方面的研究论文，由陶先生与汤象龙主编，这也是研究我国

近代经济史的最早刊物。

顺便说一说社会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的事，此事经过不全为人所知，我先前亦不大清楚。据王子建回忆，在1928年蔡元培就任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前后，蔡先生曾邀孟和先生赴南京，商谈筹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事。大概孟和先生因自己已经组设了“社会调查部”，并且计划加以扩大（见上），所以不久还是回来了^①。后来，如上所述，社会所与中研院社科所在调查研究工作上，通力合作的很好。那么为什么这两个机构后来又合并呢？原来是为情势所迫而出此。先是中研院社科所只有陈翰笙主持的社会学组在积极开展工作，而陈先生受当时政府迫害，不得不于1933年与他一道工作的研究人员离开中研院，至此中研院社科所乃几乎成为一个空机构。与此同时，在财政上资助社会所的中基会，则削减其预算，促其合并于中研院，类同“驱逐”和威胁其存在。对此，陶先生是非常恼怒的。他在致胡适书中曾说到此事，他说：

“××（中基会总干事）逼我们一步一步的太紧了。先限制我们的预算，继之以促进合并（即驱逐之变相），又继之取消我们对于现用的建筑所有权，并规定我们几时退出。现在竟公然的要求随时停止我们的补助费了。”^②

其时，丁文江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在致胡适书中亦说到此事：

“当××（中基会总干事）提出合并的问题的时候，孟和就大怒，说××‘压迫驱逐’。经我再三疏通……彼方表示可以合并。”^③

^① 王子建：《陶孟和怎样主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三辑。

^{②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50～251页，第252～253页。

由此可知，在1934年陶先生之同意把接受资助而在学术上具有独立性的社会所合并到隶属于南京政府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实出于不得已。不过在合并以后，原来社会所仍保持其原貌，一切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3) 领导研究工作作风

陶先生创办研究事业在研究人员的配备上的一个要点，是录用国内大学毕业生，培育奖进，使他们逐步成长。他原是北大教授，所以先是把研究人员的来源主要寄托在北大毕业生上。这也是由于在20年代前期，国内大学除北大外，尚少创立法科。在1926年9月陶先生与北大合办研究奖金，凡该校政治、法律、经济三系毕业生或已毕业学生的研究论文，都可以提请评奖，评定及格，由本所给予奖金，并刊印其论文。此制曾实行，评奖过赵凤喈所著《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一文。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制未能继续，以后社会所成立，乃在所内采用研究生制，录用大学毕业生。在社会调查部时期，骨干人员如樊弘、杨西孟都来自北大。但陶先生不久便发现除北大外，其他学校如清华、燕京、南开等大学的毕业生，也是人员来源之地，所以从1929年以至抗战前，北方的北大、清华、燕京、南开，南方的武汉、复旦、中大（南京）等校，都有毕业生参加社会所的研究队伍。他对录用这些毕业生是不抱成见的，凡是经学术界人士或本所人员推荐而所中工作需要和经费条件许可时，不管相识不相识，都被录用。我所见的许多人是如此，我自己也是如此。总计从1929年至抗战时期，研究人员中径从国外留学生聘来者，仅有4人，绝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是国内大学毕业生。这种情形，使社会所产生一种形象，在我们研究人员中，常说社会所是“土包子”的研究所。可是这些“土包子”朝气蓬勃，在陶先生领导之下，不断做出研究成果，使社会经济研究事业日益发展，社会所日益壮大。这可以说是他录用和培养国内大学毕业生从事研究工作的方针的成功。

但陶先生不是守旧派那样反对国外留学生。相反他是主张去国外学有所成的，具体地说，他是主张在国内先做几年研究工作，有了一些研究经验和心得，然后再去国外进修。前面曾说过，他在五四时期，即对有些混头衔的留学生公开提出批评。他在社会所研究人员的配备上，采取录用和培养国内大学生为主的方针，大概就是基于这一思想。事实说明，他非常注意国外学术事业的发展，他根据需要与可能，以后不断利用各种机会，选派所内研究人员赴国外进修。这些人员通过出国进修，以后都回到本所或在大学任教，继续为学术研究而努力。

陶先生领导研究工作的第二个要点是，发挥研究人员独立思考作用，尊重学术上自由探讨和争鸣，在研究工作上从未见他“发号施令”，以己见强加于研究人员。在社会所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回忆起，在他领导社会所的长时期中，他从来没有对所中工作做过讲话，对全体人员做过什么训示。他是一位不好发长篇大论的长者，他没有架子，热心与工作人员谈话，交流思想，他希望发挥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的领导方式是，在研究人员研究课题确定之后，能看到研究工作的进度和成果，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完全有自由找他或找同事讨论问题，或根本不找。他提倡多读书，多提出问题，多发表意见，多进行讨论。他提出的一个辅助学习研讨措施，是设立“读书会”，每两星期一次，起先多在晚间召开，不占工作时间。在会中，研究人员（多对是轮流地）每次有一人报告研究心得和问题，或介绍新出版的国内外重要书籍，或报告外出调查或参观观感。研究人员平常忙于自己研究工作，很少接触机会，这个读书会是一个很好交流思想，启发思考，扩大知识面，以及增进了解和讨论问题的机会，这个读书会，很受大家欢迎，在抗战前一直坚持未断。抗战期间在四川李庄工作稍为安定时，亦有一段时期恢复了“读书会”。陶先生就是想通过这种方法，来启发和激励大家的研究热忱。

陶先生采取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力求发扬学术民主，使各种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都可以在所中研究探讨，把社会所作为一个自由研究学术探求真理的园地。在抗战前和抗战时期，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研究和讨论，是被认可的。同时，所中也大量地介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陶先生认为这些都是学术研究，可以自由探讨。当然，“自由学术研究”不是没有立场和观点的。不过，陶先生不想把社会所办成一个当时政府的御用机构，则是可以断言的。

陶先生在处理研究行政工作上亦有其特点，简言之，即精兵简政和高效率。在抗战前社会所处于最兴盛时期，研究人员约有30人，外有图书管理人员3人（包括剪报），计算和抄写人员，合计固定和临时的多达四五十余人。在这几十人的研究所中，计行政人员仅一文书，一会计，二庶务，其中一个兼出纳，一传达收发，一跑外，共六人而已。在陶先生主持社会所的长期中，行政人员从未多于此数。在抗战时期，行政人员更减至最低度，那时一文书兼管图书和收发，一会计，一出纳兼办事务，总共三人而已。陶先生为人宽厚随和，似非长于行政工作者，其实不然。他最反对人力物力的浪费，处理所务，无论在研究工作或事务工作上，都采用当面对谈方式解决，从未采用公文旅行的审批办法。因此，得能事简人少而效率高。另外，他对所内工作人员，高度信任，并有意识地培养鼓励，因而不但使研究人员，同时也使行政人员爱所如家，发挥工作上的积极性。有两个很突出的事例。一是不久前从现在的经济所退休的图书馆员宗井滔，在1933年来所，本专管文书，因为他爱好书刊并勤学外语（不止一种），所以到抗战时当原图书管理人员离任后，他就既是文书又是图书管理员，而他勤勤恳恳，朝夕如是，把所内图书摸得一清二楚。有时研究人员按卡片找书找不到，一问他，他立刻能把书找到。由于他能看懂几种外文，所以他也能从几种外文杂志上提出新出版

的重要图书，以备采购。他这种才能和工作精神，可以说是少见的，所以到1980年评定职称时，学术委员会一致通过授予他研究员级图书馆员这个最高职称。宗井滔同志这种专心致志以管理图书馆为终身事业的志趣，不能不追溯到陶先生对他的培养和信赖，尤其重要的是他受陶先生终身致力社会所研究事业精神的熏陶。另一位是韩启桐的成长事迹，也可说明陶先生培养青年人的热情。韩启桐是一位中学毕业生，他在1934年来所任计算员，由于他能力较强，很快升任统计管理员，负责管理20余人的计算和统计工作。后由于他熟悉统计业务并对统计学有所钻研，改任为助理研究员，从事对外贸易统计资料的整理。在抗战时期，陶先生为抗战胜利后对日和谈赔偿问题作准备，提出“抗战损失估计”课题，由韩担任。到1946年韩完成此工作，后遂升为副研究员。

四、八年抗日战争时期，辗转湘桂滇川， 在困难条件下，坚持发展科研事业

1948年发表的《社会研究所概况》说：“二十六年（1937）抗战军兴后，本所自宁西迁，由湘而桂（廿六年冬），而滇（廿七年冬）^①，最后于二十九年（1940）秋迁至四川南溪李庄附近乡间，继续工作。胜利后，本院奉令复员，本所乃于三十五年（1946）秋间由川迁返南京”。我于1936年赴美进修，1939年9月返抵昆明，对于社会所由宁而湘而桂种种情形未尝亲历（只知迁到广西阳朔，约有一年），只好从略。我到昆明时，搬迁工作已就绪，大家照常工作。是时社会所工作地点有三处，一处是在城内青云街竹安巷，是一所三合院，一面有小楼，陶先生一家及一

^① 原文为“而桂（廿七年冬），而滇（廿八年冬），有误。

二工作人员住在那里。一处是在郊区黑龙潭庙宇内一座大殿，单身工作人员多在那里，也是工作人数较多之处。再一处是落索坡，是一座土坯楼房，在楼上办公，有家属者和研究经济史者多在此处。落索坡是一乡村，离黑龙潭约三里，相互联系较便。落索坡还有一唐家祠堂（唐继尧墓庐），院落甚大，那时西南联大教授吴晗等及社会所研究人员汤象龙、梁方仲等都住在那里。再旁边不远，是龙头村，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该处。我是住在办公楼后的一户农家中。去年（1985）夏季大百科《经济卷》编委会在昆明开会时，我曾漫步访看了陶老旧居，楼屋仍在。我也去看了看黑龙潭和落索坡旧址，黑龙潭现在是一郊外公园，整理得很清新喜人，落索坡则村户大增，住宅栉比，我找了很久，才找到旧办公处及住处，皆完好，办公处现作公仓用，村中人相见不相识，盖去今已45年矣。

昆明是当时西南联大所在地，加上云南大学和中研院几个所，可说是文化人荟萃之地。当时物价暴涨，物资短缺，空袭频繁，大家生活非常清苦，居城内者，有时逃避空袭，奔赴郊外，疲惫不堪，但是大家精神上则很愉快。特别有陶先生坐镇和他的表率作用，社会所同仁都能安心工作。社会所在昆明为时不到两年，安顿与适应需时，在研究工作活动上，无何突出事项可述。但回想起来，他当时在颠沛困苦生活中，仍积极筹划开展学术活动一事，颇值得一记。事情是，在1940年，他与著名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汤佩松教授发起用茶会形式，约集一些朋友讨论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并建议各人就所担任的专题写成论文，经过充分讨论，以后印成专书。我不记得此会开了几次，根据1942年他为汤佩松和我合写的一书《农业十篇》^①所写的《序》文和书中所记，先后参加此讨论会的，有陶先生夫妇、汤佩松、吴半农、韩

① 1943年独立出版社出版。

德章、丁信、费孝通、谷春帆、曹立瀛和我。他在此长序中除叙述此书产生经过，并纵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以及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可以说此文是他在1930年写的《社会科学是科学吗？》的续篇，与前面所述他在1944年的讲稿《中国社会之研究》，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关于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三篇理论性文章。这里摘录他热心推动和参加在昆明的学术讨论经过的记述如次。陶先生是有文学修养的。序的开始很富于文学风格，他写道：

“这是两年多以前的事情了。当时我们还住在昆明。一个秋天的下午，正是凡是享受过昆明的气候所永远不能忘记的天高气爽的好时节，汤佩松先生邀请几个人到北门外英国领事馆的花园里茶叙。……四周围排列着蓊郁的树木，连巍然的西山与明媚的湖景都给遮挡住了。大家围坐在浸满和煦可爱的阳光的草地上开始谈话。在这个静悄悄的自然环境，仿佛世外的一个小乐园里，我们暂时忘却了目前战争所给予我们的一切的苦难，而凝注我们的心思讨论、计划我们国家的光明的将来。那些日子我们几个人正觉得农业问题并非如一般人所相信的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不满意这种看法。我们相信农业有它的人事的、社会的方面，农业牵连着许许多多的人事的，社会的问题。总言之，农业政策除了技术的改良而外，还带着社会的经济的蕴义。一个健全的、可以实行的农业政策，固然要增进技术，但同时尤其重要的，必须认识这些蕴义，将它们分析清楚，并整理就绪。当时出席的除了我同我的太太以外^①，便是汤佩

① 陶先生的夫人沈性仁女士，研究文学，在《新青年》上即有译作发表。她对于社会经济问题亦有兴趣，在1920年与陶先生合译出版了凯恩斯的新著《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列为《新青年丛书》第六种。

松、吴半农、巫宝三、韩德章四位先生。……他们当然对于农业政策持着与我们相同的意见。这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们的一个集合。经过了相当的讨论与意见交换之后，汤先生便提议由出席的人们各担任若干专门题目，写成论文宣读，经过充分讨论以后，再将论文写成定稿，印为专书。大家对于这个提议都欣然答应，并提议邀请丁信、费孝通二位先生参加。”

这段生动的文字，把陶老一心为学术研究的思想 and 情操都体现出来了，这是在陶先生的其他文章中不大见到的，故录之于此。这也是一则史料。

社会所于1940年迁到四川李庄以后，整整住了六个年头。人心定了，时间长了，虽然人员不多，在此期间也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李庄是在叙府（宜宾）下，长江旁的一个集镇，同济大学已先迁到此镇，中央研究院的社会所、史语所、人体所，还有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则分布在邻近乡村。另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亦在镇上。可以说，李庄亦当时一小文化区也。社会所大致与在昆明时相同，一处在门官田村，单身人及住镇上者都在此工作，图书和行政工作亦集中于此，可以说是社会所的总部。另一处在石崖湾村，住家者和研究经济史的部分人员在此工作。陶先生夫妇住在镇上。李庄虽说是一个文化区，但究与西南联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济是一理工医大学，无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辈友好在此不多，经常来往晤谈者，仅梁思永、思成兄弟，李济、董作宾等数人而已。同时陶老的夫人当时健康欠佳，后去兰州休养，在抗战后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时间住在李庄，生活孤寂可知。但处境虽然如此，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头戴大草帽，身着灰短裤，徒步往返于镇上与门官田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在陶先生领导之下，社会所在此期间的研究工作有几项受到

有关方面的重视。一是前面提到过的“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陶老对第一次大战各国各方面损失估计以及和会谈判情形十分了解，所以提出早日进行研究，为以后抗战胜利和会谈判赔偿问题提供材料作准备，这是一项具有预见性的重要研究工作。我记得解放后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周总理曾派人了解过去社会所所作的抗战损失估计。虽然后来我国为表示对日本人民宽大友好，放弃赔款要求，但仍证明这项研究估计工作是有意义的。二是关于我国国民所得（国民收入）的研究。这是我在那时所提出的一个研究项目。我记得当我向他征求意见时，他表示非常赞成，以后在配备助手进行此项工作上，他给以充分的支持。这项工作是在李庄与汪敬虞、章有义、马黎元、南钟万等同志一道完成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陶老的支持，这项工作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此外尚有丁文治、彭雨新等的田赋征实的研究。徐义生的《广西省县行政关系》研究，姚曾荫的《广东华侨汇款研究》等等，就不一一具述了。三是关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包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革命史，严中平的我国棉纺织业史，梁方仲的明代一条鞭法，李文治的晚明民变等研究，都成就卓著。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陶先生乡间办公室里看到他在用英文写稿子，他告诉我，他在为严中平的棉纺织业史的书稿译成英文^①。这不禁使我十分敬佩他不辞辛劳为学术工作而效力的精神。总之，在李庄这几年中，虽然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恶劣（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仅有竹“墙”相隔，真可谓与牛马为伍），社会所的研究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而这成绩的取得，实由于陶先生的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学术研究，甘苦以之的精神所感召。在这期间，还有不少青年从重庆中大、武大、湖南大学、西南联大远来参加社会所的研究队伍，陶先生都表示欢迎。当时这些青年，现在都已成为专家

① 这是受“太平洋学会”资助的一项研究。

了。

在此我还想谈谈陶先生的政治态度。在李庄我与丁文治也是住在镇上的。稍后我妻孙家琇去武大任教，我和陶先生常在一道晚餐（晚餐是由门官田食堂带回的）。他当时以社会贤达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每年总有一二次去重庆参加参政会和中央研究院的会议，有很多官场见闻，我现在记得不多，但有二则一直深印在我脑海。一是关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情形，记得他引用周贻春（抗战前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任农林部长）的话说，国民党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Rotten to the Core），就是说不可救药了。另一则是他谈到一些趋炎附势的所谓名流，说这种人见到最高层人物，屁股坐在椅子边边上，只能连声道是。寥寥数语，把一些名流形容得维妙维肖，令人捧腹不止。这两则谈论，语简意赅，可以说明陶先生之尽瘁于社会所，并不寄存希望于国民党政府，自己更不愿染指官场，而是旨在培育和保存一些人才，对社会经济现实和历史进行一些系统研究，俾有助于社会经济改革的参考。所谓“留得青山在”者是也。

在此期间，还有一事表现了陶先生待人处事的风格，亦令我毕生难忘。1944年时，抗战胜利在望，重庆有“善后救济总署”之设，是处理和分配美国提供的剩余物资从事战后救济的机构。当时蒋廷黻任署长，一些好心的朋友向他推荐我任该署调查处处长。蒋遂致电陶先生征求意见，大公报并已作了报道。陶先生接电后，举以示我，未提出任何可否意见，意思是让我自己决定。后来我表示我手头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不想离所往任该职。陶先生遂据我意见以复，亦未对此发何议论。他在此事上尊重我的意见的态度，使我深受教益。事实上，我之未接受此职，是感到官场生活，非己所习。与其疲于逢迎，还不如僻处穷乡，落个清静。我想我这个思想，也很多得之于陶先生的身教。

五、解放战争时期，坚守岗位， 反对迁台，迎接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了，解放战争开始了。社会所于1946年从四川迁回南京。时国民党政府已日益临近崩溃，随着几大战役的失败，遂企图南逃，以图幸存。在这整个形势中，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及珍本图书文物，亦在奉令准备南迁以至最后迁台之中。陶先生是反对与国民党政府共存亡的。他极力反对中央研究院南迁。他想如果他不能阻止整个中央研究院南迁，至少他也要把社会所和尽可能其他所保存下来。同时，他对故宫博物院珍藏文物和北京图书馆珍本图书的流失，非常关心，也极力反对南迁的计议。陶先生其时患心脏病，他不顾年老体弱，单身住在研究所办公室，照常主持所务，给所中工作人员以精神上的支持，同时也与当时恶势力作斗争。随着1948年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南逃和迁台计谋在加紧进行。陶先生为了揭露南京政府南迁古物图书的阴谋和发动社会舆论来阻止这种阴谋的进行，在不同场合呼吁广大社会人士起来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南迁古物图书的举动。当时国民党政府特务分子制造种种谣言，污蔑共产党和解放军，企图混淆黑白，扰乱民心，达到它骗惑群众随其南逃的目的。我在1947年冬赴美进修，当我在1948年冬回到南京后，即有友人告诉我社会上流传着一些谣言。陶先生的呼吁，是代表文化界与国民党政府阴谋对着干的一种行动，起到揭露阴谋和镇定民心的作用，也显然冒了被特务分子列入黑名单的危险。但陶先生正义凛然，毫不为所动。待稍后南京机关大搬场时，中央和北平两图书馆的善本图书以及故宫的最精美艺术品，都先后搬去台湾，陶先生在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1949年3月6日）。陶先生说，对于这种搬迁，“我们积极的反对，我们

严厉的予以斥责。我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尽速将它们运回”。他所列举的“最根本的反对理由”是，“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的人民的”。于此，陶先生反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的立场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陶先生的这种立场还表现在反对中央研究院迁台一事上。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奉命全部迁往台湾。中研院在南京有地质所、气象所、数学所、物理所、天文台、史语所、社会所等，在这些所的所长中，当时有坚决主张不搬的，也有主张搬走的，陶先生是坚决主张不搬的。据所中很多同志回忆，陶先生当时对大家说，“朱家骅（当时是中研院院长）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会把我怎么样”^①。全所人员一致拥护陶先生的主张。陶先生和全所人员这种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南京各研究所反搬迁的斗争，也对中研院在上海的各研究所在反搬迁斗争上产生重要影响。到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时，尽管南京个别研究所如史语所在这之前已与中研院总办事处去台（但也有不少人未去，如梁思永、夏鼐、丁声树、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等），社会所工作人员则坚守岗位，护院护所，没有一个人跟随他们去台湾，所中图书资料没有丝毫损失，这应完全归功于陶先生的反搬迁和迎接解放的坚定主张。解放军入驻南京之次日，三野司令员陈毅将军衣灰布军服，带一位警卫员，来社会所办公楼看望陶先生，陶先生事先固不知也，即衣布长袍至会客室，互道姓名以后，乃知是陈总。此情此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纸币几成废纸，物价无限制地上涨。人民生活可谓朝不保夕。在此时期，社会所研究工作亦很难希望如平时那样进行。但陶先生处此艰苦时期，除了一方面不断与顽

^① 见李文治、汪敬虞、彭泽益《关于陶孟和先生》文，《工商经济史资料丛刊》第三集。

固势力作斗争外，还积极为社会所开展研究工作准备条件。在这方面较为突出者，是陶先生在此期间注意延聘和吸收各级研究人员。因为在抗战八年辗转湘桂滇川各地时，所中研究人员或因大学任课需要，或因政府经济工作需要，或因出国进修等等，不少人员离开研究所，所以在胜利后陶先生多方延聘研究人员，如聘许烺光教授为专任研究员，聘陈振汉、张培刚二教授为兼任研究员，等等，同时也录用一些大学和大学研究院毕业的青年人员来做研究工作，如彭泽益、刘国光、万典武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参加社会所的。虽然由于当时物价狂涨，生活不安定等原因，所聘人员有的未能到所任职，但陶先生为开展研究工作而积蓄和培育人才的措施，在解放后新中国的研究工作中就结出丰硕的果实了。

解放后，成立中国科学院，改组了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陶先生任科学院副院长兼社会所所长。先是，社会所仍设在南京，后因工作上需要与中央机关有较多联系，同时陶先生亦需要长住首都，所以社会所于1950年在京设立了一个工作站，有少数研究人员在京工作，亦便于陶先生直接领导。但一所二地，在图书资料的利用及研究工作的进行上，终究不便，最后于1952年底社会所全部由南京迁到北京。同时陶先生因任科学院副院长，难以兼顾社会所所务，征得科学院同意遂辞去了社会所所长职务。从1953年起，由于国家有专设经济研究所的需要，于是乃把社会研究所更名为经济研究所。所以到1952年底，可以说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研究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陶先生把他一手创建、中经重组和发展、始终由他主持达26年之久、并且最初是以研究人民生活问题开始的社会所，最后奉献于人民，他在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上，是具有独特的和不可磨灭的功绩的。

六、五十年代欢欣鼓舞与直言不讳

人民的新中国成立了，这是陶先生曾经在五四时代提出过的要求和希望，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现实了，陶先生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可以想见。当他应召由南京北上之时，他对新中国科学院的诞生是满怀信心，并准备对此有所效力的。听说陶先生到北京后，即搜集各国科学院的历史及其近况，草拟中国科学院组织方案，送呈当局参考。并且在党筹备召开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时，他提名了好几位在旧社会文化教育界卓有成就的无党派人士任政协委员。以后中国科学院成立。院址即在30年代原社会调查所与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旧址，而被任命为副院长陶先生的办公室，就在他原任社会所所长的办公室，旧地新任，陶先生当然会百感交集，而力图在科研事业上有所贡献。在经济研究所于1954年迁到西郊中关村新址之前，我由于一方面是陶先生多年培育的学生辈，另一方面从1950年起我被任命为社会所副所长，协助陶先生管理所务^①，并且我们住处相距不远，所以我经常到陶先生住所请教。社会所全部人员都是从国统区过来的，对党史、对马列主义，都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这样，就难以在新的局面下开展工作。而陶先生以及所中人员都是本着善良愿望，急图能为新中国社会经济建设有所效力。为了改变这种主客观不相一致的情形，社会所全部研究人员，包括我在内，提出参加华北革命大学的学习班，学习理论，改造思想。此意得到院方的赞同，记得郭沫若院长同全体人员谈话，慰勉有加。这个学习，历时约10个月，到1951年初结束。此后接着参加土地改革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主要都是为了改变主观条件，为以后开展科研工作作准

^① 在1952年，严中平亦被任命为副所长。

备。但在这些运动进行中以及运动后，研究工作仍然一筹莫展，特别以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为然。对此，陶先生和我都是十分焦急的。事实上，解放后的社会所和1953年由我任代理所长的新更名的经济研究所^①，都在改造和改建过程中，开展现实经济研究工作尚难提上日程。对于这一点，我和所中同志都是有所认识的。所以那时我们力主派党员经济学家来领导研究所。对此，陶先生亦深以为然。但是，应该承认，我对迟迟不能开展研究工作，还是有焦急心情的，因此有时不免纳闷。大概陶先生也多少有此心情。当陶先生看到所中人员有时写了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他就高兴地说，“这不是说明我们还可以做些工作吗？”于此，我颇感到，当时主管社会科学的副院长是陶先生和陈伯达，以陶先生长久领导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丰富经验，他很可以对新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开展有所作为，然而实际上陶先生未能真正发挥他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发展社会科学事业的一个损失。

陶先生对解放后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对政权建设和干部的朴素作风，对工农翻身以及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都是极为欢欣鼓舞的，他对党和政府是极为拥护的。但是他对当时科研事业的开展情况不是没有意见的。他在这方面的意见，在1956年开始的党的整风运动向党外人士征求意见过程中，曾有所表明。我记得在1957年7月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批判曾昭抡等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会议过程中，也曾散发了关于陶先生某些言论的材料。大概由于陶先生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是与会者所共知的，大家对那材料反应并不强，同时大概由于受到领导上的保护，陶先生后来没有成为批判对象。不过陶先生对于“反右派斗争”大量知识分子受到批判斗争的这一场运动，是有意见

① 1954年起由狄超白任所长，我和严中平任副所长。

的。陶先生为人谦逊，一向不好把自己意见强加于他人，也能容纳他人的意见，但同时他为人耿直，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即使是逆乎众议，他也要仗义直言。他这种处世态度，在“反右派斗争”高潮中，又一次表现出来。记得同年9月间中国科学院在中山堂举行了两三天的批判会，批判“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政治阴谋”，被点名批判的是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李景汉四位教授^①。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批判会，也是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反“右”批判会的最后一次会。会议由郭院长主持，有很多名流参加和发言。在发言过程中，我没有想到陶先生也报名作了发言，而他的发言是使我吃惊的。我记不起他的发言的全部，但它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当受到敌视（大意如此）。就是说，他认为当时把许多知识分子当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敌人来斗争，对社会进步是不适宜的。前年我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时，遇到某教授，谈到那次中山堂的批判会，他说他也去参加了，他说陶先生在发言中，曾说当时的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他说就他所知，“浩劫”一语是始自陶先生的那次发言。关于这一点，我虽然记不起，但与上述发言之意是相通的。合起来看，可以知道陶先生那次发言更多的内容（现未查到发表的记录）。陶先生这次的发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但以素不习惯于在大会发言的陶先生，竟在此会上作此发言，他是从国家前途考虑，而出此净言的。此净言在当时当然是没有被接受的。我记得，最后主席作总结讲话时，曾对陶老提出警告。现在看来，陶先生诚为当时“一士之谔谔”，敢于直言，实有足多者。

^① 未点名的还有很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反“右”风暴以后，陶先生还是受到领导方面的尊重和礼遇的。随后他看到国家政治经济又逐渐步入正轨，他的心情也显得大为舒畅了，依然高度关注国家科研事业的发展。他是在1960年4月初去上海参加科学院的一个会议时病故的。当去上海之前，科学院领导曾考虑到陶先生的健康状况，不适于长途旅行，力劝他留京休养，但陶先生兴致很高，认为他的健康状况甚佳，坚持要去。不想后来在沪竟因在参观途中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4月17日去世，终年72岁。

陶先生的净言，在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已经体现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制定的一系列改革的方针政策中。知识分子遭受“浩劫”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今是知识分子真正发挥作用的春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已被证明不再适合于1956年以后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时代了。所有这一切改革以及其巨大成就，一定会使陶先生含笑于九泉。

总结陶先生的一生，他在人品上是敦厚正直无私的，在政治上是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和民主的，在学术上是有成就的，在开创科研事业和培育人才上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他的这些高尚品德和重大贡献，将永远留传后世，为人们所怀念和受到人们的崇敬。

1986年6月初稿

1990年6月改订稿

（巫宝三，190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